

总想当保守派的革新派

——翻译家林纾新论

何辉斌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杭州 310058)

摘要: 通过诸多名家之口, 证实林纾是近代历史上译介西方文学成就最高的人; 指出林纾相比翻译家的头衔, 他更愿意以古文家自居。史料证明, 林纾创作古文非常认真, 而翻译极其追求速度, 其古文的功底给翻译带来了奇特的效果。认为, 他最早发现西方文学的价值并引进西学, 之后又与以西学否定传统文学的激进派展开论战, 是一个总想当保守派的革新派。

关键词: 林纾; 保守; 革新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2)04-0259-05

A Conservative Translator with Real Innovative Spirit

—New Perspectives on Lin Shu

He Huib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Lin Shu is proved to be the most famous translator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China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last century by quoting many famous scholars; but Lin Shu regarded himself as a classicist rather than a translator. According relevant historical data, Lin Shu was very meticulous while creating as a classist, and he cared more for speed while translating, but sometimes his genius as a classist made his translation very charming. It is also discovered that Lin Shu criticized severely the young radicals, who wanted to overthrow the classic Chinese tradition, although he was the first Chinese scholar who came to recognize the artistic value of the Western literature, and that he was a very innovative man, who claimed himself to be a conservative.

Key words: Lin Shu; conservative; innovative

林纾“独嗜西籍”^{[1]6}, 是近代历史上最早认真地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之一, 被胡适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2]。另一方面, 他又“嗜古如命”^{[1]24}, 以捍卫传统文化为己任, 被看作保守派的代表, 钱玄同甚至视之为“桐城谬种”。林纾此人

非常复杂, 他身上所体现的保守力量与革新精神的关系值得我们仔细揣摩。

一、对翻译不以为然的大翻译家

林纾在翻译史上必然有一席之地, 因为他的译

收稿日期: 2012-04-28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阶段性成果(09CGWW007YB)

作者简介: 何辉斌(1968-), 男, 教授。研究方向: 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史、文学认知批评。

E-mail: hehuibin@163.com

作在数量、质量和影响力方面都远远超出同辈。林纾虽然从四十多岁才开始翻译,但他在走上这条道路后非常投入,产出非常可观。他曾说:“更能不死者,即强支此不死期内,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1]57-58} 他的积极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据张俊才教授的统计,林纾翻译作品共 246 种,发表过的作品 222 种,未刊作品 24 种;原著者知晓的作品 181 种,不知晓的 65 种;涉及 11 个国家和 107 名作家,其中包括 62 名英国作家的 106 种作品,20 名法国作家的 29 种作品,15 名美国作家的 26 种作品,3 名俄国作家的 13 种作品,以及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 7 国的 7 名作家所著的 7 部作品^[3]。翻译的作品如此之多,涉及国家如此之广,实属罕见。

林纾的翻译富有开创性。胡适曾说:“中国人能读西洋文学书已近六十年了;然名著译出的,至今不满二百种。其中绝大部分,不出于能直接读西洋书之人,乃出于不通外国文的林琴南,真是绝可怪诧的事!”^[4] 胡适说这句话,主要是为了批评翻译界,但间接表扬了林纾。在当时,林纾绝对是翻译界的领军人物。

林纾翻译的作品不是每一部都属于上乘之作。梁启超说:“亦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颇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5] 赵景深也说:“但惜不识西文,所译多系无名作品,空费了许多光阴,这实是一个极大的损失!”^[6] 林纾不懂外语肯定是一个缺点,但关于他所选作品的档次问题之批评并不完全正确。虽说林纾翻译了较多没有多少文学价值的作品,但他的译作中有四十多部文学名著。就算别的译作价值不高,光是这四十多部著作已经足够让他在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林纾的翻译不但在质量和数量上优势突出,而且影响力非常大。根据钱钟书的回忆,林译小说非常有魅力。他说:“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7]259} 郭沫若也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种读物。”^[8] 谭正璧曾经把他称为“外国文学之传入与译界之王”。^[9] 林纾的翻译对胡适、鲁迅、郭沫若、钱钟书等前辈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为五四运动的到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曾经说:“像诗人爱自己的诗篇,父母疼自己的儿女一样,

赚钱者爱自己的钱财,不单是因为钱有用,而是因为钱是他们自己的产品。这种人真讨厌。他们除了赞美钱财而外,别的什么也不赞美。”^[10] 按照这种观点,翻译家林纾应当很珍爱自己的译作,但事实并非如此。康有为曾经在给林纾的画赋诗时说:“译才并世数严林。”^[11] 他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多数学者的看法。有意思的是,这句话却没有讨得这两位大翻译家的喜欢。根据钱钟书的回忆,熟悉严复和林纾的李宣龚先生曾说:“康有为一句话得罪两个人。”^{[7]279} 钱钟书还分析道:“严复一向瞧不起林纾,看见那首诗,就说康有为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也不认识的‘译才’,自己真羞与为伍。至于林纾呢,他不快意的有两点。诗里既然不紧扣图画,都是题外的衬托,那末第一该讲自己的‘古文’,为什么倒去讲翻译小说?舍本逐末,这是一……喧宾夺主这是二。”^{[7]279} 钱钟书的论述很有道理,康有为不谈林纾的古文,只谈翻译,而且置之于严复之后,当然不会让林纾高兴。林纾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人,虽说他为翻译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却更希望别人把他放在古文家的位置上。林纾对自己的古文极度自信,认为“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7]281}。可能他万万没有想到,作为副业的翻译改变了整个时代,而他精心创作的古文,并没有能够延续这一文类的辉煌,在新时代没有多少读者。对于林纾来说,翻译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当然,林纾的翻译和古文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立,有时甚至可以统一起来。林纾翻译小说时使用的是古文,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翻译的作品是译作和古文的统一。但用古文翻译西方现代小说并不容易,就好像把中国的白话小说译成拉丁文一样困难。所以林纾在翻译的时候,不得不对古文进行改装。钱钟书指出,林纾的古文已经不是桐城派的严格意义上的狭义“古文”,桐城派古文有着许多古板规定,难以自如地在小说中使用。林纾使用的是“他心目中被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7]271}。钱钟书发现,林纾的翻译文体比较混杂:“为翻译起见,他得借助于文言小说以及笔记的传统文体和当时流行的报章杂志文体。但是,不知道是良心不安,还是积习难除,他一会儿放下,一会儿又摆出‘古文’的架子。”^{[7]274} 用古文翻译小说实在不方便,但林纾还是时时不忘古文家的职责,准备着露一手。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林纾用古文翻译小说,有利于提高这种文类的地位。周作人指出,林纾“打破了桐城派的‘古文之体忌小说’的主张”^[12],用古文翻译有利

于帮助小说进入文人的法眼。从消极的角度来说，用于翻译小说的古文不是真正的古文，不光是别人不承认，就是林纾自己也不以为然，不把翻译当作什么伟大的事业。

二、含有不少错误却富有创造性的翻译实践

林纾翻译的著作有不少错误。导致差错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不懂外语，更与他的翻译速度、态度和文人的身份相关。

林纾翻译的速度非常快。从1897年开始翻译至1924年去世，林纾一直译笔不辍，大作迭出。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中，翻译了如此多的作品，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林纾曾说：“近年与曾、魏二生相聚京师，乃得稍读欧西小说家言，随笔译述，日或五六千言，二年之间，不期成书已近二十余种。”^{[1]23}他在另一个地方也说：“予不审西文，其勉强厕身于译界者，恃二三君子，为余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已而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其间疵谬百出。”^{[1]62}林纾把合作者的工作叫做“口述”，把自己的工作叫做“笔述”。他4个小时就能够翻译五六千字，流畅的行笔只能让人叹为观止。“耳受手追，声已笔止”已经成为林纾翻译风格的标志性特点。他的学生还用更加夸张的方式描述，用“运笔如风落霓转”来形容他的翻译过程^{[13]2}。面对众多国家的风格各异的作品，能够如此神速地翻译出来，的确是一个奇迹。

翻译的速度快，从态度上说往往不够细心。如果把林纾的翻译和古文创作做一个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两者的不同态度。他在写作古文时，非常认真：“然每为古文，或经月不得一字，或涉旬始成一篇。”^{[13]2}与他的几百种译著相比，他创作的《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等的篇幅非常有限。可见速度和态度成反比关系。

当然，林纾的翻译并非都是草率之作，高质量的也有不少。钱钟书在研究林纾的时候发现，他的翻译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民国二年为分界线：“前期的翻译使我们想象出一个精神饱满而又集中的林纾，兴高采烈，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后期翻译所产生的印象是，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乏的手指驱使着退了锋的秃笔，要到达‘一时千言’的指标。”^{[7]268}后期由于翻译得仓促，甚至“连稿子上显著的‘杜撰字’或别字都没

改正”^{[7]265}。钱先生的分析比较到位，林纾既有粗糙的翻译，也有认真的翻译，但总体上看，他翻译的速度过快，态度不是很认真。

林纾的译文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经常随心所欲地增删和修改。刘半农曾这样批评林译小说：“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全非’。”^[14]钱钟书倒是以积极的心态看待这个问题，他指出：“换句话说，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色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7]262}林纾的确经常和原作者抢戏。他在翻译完《黑奴吁天录》时说：“《录》本名《黑奴受逼记》，又名《汤姆家事》，为美女士斯士活著。余恶其名不典，易以今名。”^[11]这种易名，虽是不忠实的翻译，但还是不错的创造，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钱钟书曾说：“假如我前面没有讲错，那末林译的‘讹’决不能完全怪助手，而‘讹’里最具特色的成分正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也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起了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多少因此而免于全被淘汰。”^{[7]265}从这个角度来说，古文家的才气大大提高了林纾的译作水平。成为著名学者和外国文学专家之后，钱钟书偶尔翻开林译作品的时候，竟然仍能读得津津有味。他甚至说：“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7]276}有这种感觉的还不是钱钟书一个人。郭沫若也曾说：“我到后来虽然也读过 *Tempest*, *Hamlet*, *Romeo and Juliet* 等莎氏的原作，但总觉得没有小时候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译述来得亲切了。”^[8]可见林纾出众的古文功底和出色的文学天赋给译文带来了不少魅力，有时甚至点石成金，把原作的水平大大提高。

三、在两面夹击中义无反顾地充当传统文化的捍卫者

鸦片战争之后，许多人认识到了西方人的科技实力，戊戌变法时期，有识之士同时意识到西方政治上的优势。但关于西方的文化，大多数人一直有一种偏见，自认为本国文化是最优秀的。林纾是最早开始欣赏西方文学的人物之一。他提倡“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15]。与前辈相比，他终于把文化列为开放的领域。他不但认为西方有文学，

甚至认为他们的有些文学比我们的更好。他在译完《伊索寓言》的时候说:“夫寓言之妙,莫吾蒙庄若也。特其书精深,于蒙学实未有裨……伊索氏之书,阅历有得之书也,多言诡托草木禽兽之相酬答,味之弥有至理。欧人启蒙,类多摭拾其说,以益童蒙。”^[116]他充分肯定了《伊索寓言》的优点。他还把这部作品和传统的齐谐小说相比,觉得相形见绌:“专尚风趣,适资以侑酒,任为发蒙,则莫逮也。余非黜华伸欧,盖欲求寓言之专作,能使童蒙闻而乐笑,渐悟乎人心之变幻、物理之歧出,实未有如伊索氏者也。”^[117]林纾对伊索的推崇是比较公允的。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对文化层面的开放起了很大的作用。周作人指出,林纾“打破了中国人的西洋无学问的旧见”^{[12][168]}。有了林纾这样的开明之士,西方文学才能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为了让国人更好地接受和理解西方文学,林纾经常探讨中西文学相通的一面。他说:“今译欧文之书,知中西一致,初若有会于吾心,故言之。”^[1146]他断定中外文学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要皆归本于性情之正、彰瘝之严,此万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1162]。在他看来,中西方的伦理道德也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他说:“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失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弟虽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三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11107]既然西方文化也很优秀,并且不会和传统文化相悖,我们当然可以好好学习。林纾翻译完一部关于为母亲复仇的哈葛德小说之后说道:“然则此事出之西人,西人为有父矣,西学可学矣。”^[116]中西之间的共通性有利于打通中西文学之间的藩篱,为新文化运动打下了基础。

林纾主张开放,主要不是因为西方比我们好,首先是为了证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相通的,从而说明中国文化具有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杨联芬曾说:“如果说晚清文学家中强调中西文学之‘异’的,对话的主要针对者是追求‘新’、渴望‘变’的激进者,那么林纾强调中西之‘同’,其潜在对象则不是‘新派’,而是‘旧派’,是一些对西学误会、怀疑或拒绝的士大夫。”^[17]这个判断有一定的道理,林纾的解读的确为保守派架起了一座通往西学的桥梁。但出乎林纾意料的是,他翻译的小说对激进派的影响却远远超过对保守派的影响。中西文化的渠道开通之后,西方的洪峰一波高过一波,本国文化步步退缩,激进派甚至以此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将西方

文化看作普世价值。这是林纾完全没有预想到的。虽说林纾已经远远超越了看不见西方文化之价值的前辈和同辈,但他最多也只是想说明,西方文化也很灿烂,打心里他也有一种中国文化优越感,绝对不希望本国的文化被西方文化压下去。历史的列车很少平稳地运行,常常“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西方文化在国门之外徘徊这么多年之后,终于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力量,人们开始“蠲弃故纸,勤求西学”^[112]。面对彻底否定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他感到完全无法接受,他决定“拼此残年以卫道”,和五四运动的青年们唱对台戏。

作为古文家,林纾痛心疾首地感叹道:“吾国百不如人,独文字一门,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词尽夺其故,是并文字而亦亡之矣。嗟夫!”^[1139]但林纾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是选择坚决抗争。他坚持认为,“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118]他甚至说:“学非孔孟均邪说,话近韩欧始国文。”^[119]面对主张废除古文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11108]林纾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林纾感到很不开心。他在《答大学堂蔡鹤卿太史书》中指责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11107]。在《孝友镜·译余小识》中,林纾指出,“然今年所见,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120]。对于暴力革命,他更是深恶痛绝:“若高言革命,专事暗杀,但为强敌驱除而已,吾属其一——为卤!”^[1158-59]清朝解体之后,他感到非常痛苦,并且开始年年到光绪帝陵寝拜谒。林纾虽是新思想的传播者,但无法容忍后来者超过他的底线。当人们一意革新的时候,他用极端保守的方法来抗衡。

林纾在与激进派进行论战的同时,还得处理古典派内部的矛盾。林纾的古文功底当然非常扎实,钱基博曾说:“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云。”^{[21][124]}但章太炎本人并不认为林纾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他曾经说:“并世所见,王闳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气虽飏,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122]作为复古派,章太炎批评的正是林纾的革新一面,指责他用古文翻译不登

大雅之堂的小说，使文风变得“杂污”。虽然林纾以传统文化的捍卫者的身份和革新派进行论战，但传统学者内部并不买他的账，甚至批评他本身偏离了传统。激进派也看出了林纾的这种尴尬的身份。陈独秀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23]他甚至还说：像林纾这样的“冒充古文家”的老头，要“当做保守派，当做旧的，来和我们对抗，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恐怕有点不配”^[24]。就是这样两面不讨好，林纾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为传统而斗争。

晚年的林纾在两面夹攻中过日子。钱基博曾经说：“于是纾之学，一细于章炳麟，再蹶胡适。”^[22]¹³⁷但他的困境也可以比较正面地解读。寒光曾说：“中国的旧文学当以林纾为终点，新文学当以林纾为起点。”^[25]革新派批评他，说明他国学功底扎实，是旧文学的代表之一；复古派批评他，说明了他富有革新的精神。两面受挫和左右逢源是相反相成的。把林纾放在中国文化史上看，他对于新学的贡献远远大于守卫传统的作用。但他本人的观点肯定不是如此，他是一个（特别在晚年）一心想当保守派的革新派。

参考文献：

- [1] 许桂亭. 林纾文选[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 [2] 胡适.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M]//胡适全集(第二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274.
- [3] 张俊才. 林纾评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92-293.
- [4] 胡适. 论翻译——与曾孟朴先生书[M]//胡适全集(第三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803.
- [5]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98.
- [6] 赵景深. 中国文学小史[M]. 上海: 光华书局, 1928: 205.
- [7]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M]//薛绥之, 张俊才. 林纾研究资料.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259.
- [8] 郭沫若. 少年时代[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122.
- [9] 谭正璧. 中国文学史大纲[M]. 上海: 光明书局, 1925.
- [10]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7: 5.
- [11] 康有为. 琴南先生与《万木草堂图》, 题诗见赠, 赋谢[J]. 庸言, 1913, 1(7): 5-8.
- [12] 周作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薛绥之, 张俊才. 林纾研究资料.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168.
- [13] 陈希彭. 十字军英雄记·序[M]//十字军英雄记. 林纾, 魏易,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06: 2.
- [14] 刘半农. 复王敬轩书[M]//薛绥之, 张俊才. 林纾研究资料.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129.
- [15] 林纾. 黑奴吁天录·例言[M]//黑奴吁天录. 林纾, 魏易,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1: 2.
- [16] 林纾. 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M]//薛绥之, 张俊才. 林纾研究资料.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96.
- [17] 杨联芬. 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4): 1-28.
- [18] 林纾. 畏庐续集·文科大辞典序[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10.
- [19] 朱义胄. 林畏庐先生年谱(卷二)[M]. 上海: 上海书店, 1948: 62.
- [20] 吴俊. 林琴南书话[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123.
- [21] 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124.
- [22] 章太炎. 与人论文书[M]//章太炎全集(第四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168.
- [23] 陈独秀. 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M]//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505.
- [24] 陈独秀. 陈独秀致胡适信[M]//周天度. 蔡元培传.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56.
- [25] 寒光. 林琴南[M]//薛绥之, 张俊才. 林纾研究资料.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198.